

# 中国的理论语言学

——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眸子

才读罢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又看到了她的姊妹篇《中国理论语言学史》（邵敬敏 方经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该著作上溯先秦，下至当今，纵横包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寻觅发掘中国理论语言学发生发展的轨迹和特点，气势恢宏，材料丰富，见解深邃，很值得一读，也很值得一评。但是，要把这部30万言的大作读透并非易事，且在一篇小文中要对她进行全面评论也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本文只打算就该书涉及的关于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作些评论。

## 一、中国有没有理论语言学

有一种虽不见经传但却很有市场的看法，那就是认为中国没有理论语言学。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为把理论语言学等同于普通语言学。毫无疑问，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是相当薄弱的；但是，这部大作认为，对于理论语言学应作广义的解释，即“为一般语言或者个别语言，从宏观和微观不同角度提供一套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2页）。

把对于个别语言的理论研究纳入理论语言学范畴，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观念。因为：（1）任何关于语言的一般看法都来自

对个别语言的认识，对于个别语言的理论认识是形成关于语言的一般看法的基础。(2) 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虽然就理论上而言是对人类所有语言的一般性概括，然而就已有的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说，其实都难有这样高的理论高度。到目前为止，人们所研究的语言数目还是相当有限的，绝大部分所谓的“理论”只反映对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的认识。既然如此，把对于个别语言的理论研究划归理论语言学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是理论语言学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的语言理论不可能对所有的语言都研究过了再建立，而只能先对若干个个别语言的理论认识进行抽象概括，然后再不断地丰富发展，乃至重新修正建立。由此也可以看到对于个别语言研究的理论意义。

如果该书关于理论语言学的广义理解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中国不仅有理论语言学，而且，理论语言学的成果也不算少。汉语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它有众多的方言和历史文献；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之一，并与周围的许多语言形成了较大的语言联盟。因此，全面地深入地充分地发掘中国对汉语、汉语方言、汉藏语系及其语言联盟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必然能够大大地丰富、修正和发展普通语言理论。就此而言，这部《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也是很有价值的。

## 二、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特点

邵、方二位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历史发展以后，把它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吸收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有所选择、有所改造、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特别注意用中国境内语言，尤其是汉语研究的丰富经验和出色成果来丰富语言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理论价值的新观点、新方法；第二，继承小学传统，将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贯穿于具体的语言事实的研究之中，因此，往往语言的事例相当丰富，具体分析也十分精细，而所用的理论与方法则需要细心揣摩，不能一目了然；

第三，缺乏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概括、提高的自觉意识，因而导致了我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脉络不够清楚。（3~4页）

这些特点是否全面还可以再研究，但是，这三个特点提得中肯却是不用怀疑的。从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胡以鲁的《国语言学草创》到现在流行的语言学概论之类的教材、著作，从早年的《马氏文通》到现代关于语音、词汇、语义、语法、修辞以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论文论著，几乎都有域外语言学的或隐或现的背景。但除了极少数论文论著外，又都有创新之处。由于我国的学术风范，许多论文论著所使用的方法，所依据或提出的理论，往往体现在对语言材料的处理中，顶多是点到为止，很少专节专章论述。我国是以写史著称的国家，但是，语言学史的研究并不发达，语言学批评也不怎么兴旺，科学意义上的学派没有形成，学术发展的连续性较差，这就使得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往往混乱模糊。这些特点仿佛给人以中国没有理论语言学的假像或错觉。要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就必须克服这种错觉，透过这种假像，去细心揣摩，深入发掘。这部《中国理论语言学史》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还做得比较成功。

### 三、怎样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

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应该从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中国理论语言学由于不明晰不系统，因此，运用什么样的史料来研究便成为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在史料的运用上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这部史书运用史料的特点是：1. 重视从大量的论文中提炼、归纳、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发展线索；2. 注意利用前言、后记、例言、序、跋、综述、评介等材料去发掘关于语言的一些理论和历史线索；3. 从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中去挖掘理论和方法，包括从这些分支学科的描写性的论文论著中去发掘；4. 较为

重视中国语言学界开展的对一些专题的讨论，比如30年代文法革新的讨论，50~60年代关于语言与言语问题的讨论，60年代关于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问题的讨论，汉语规范化、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建国后几次语法领域的大讨论等；5. 从译介和评论国外语言学的材料中去发现译介评论者的语言学态度和研究心得等；6. 注意从语言文字的具体工作中去总结，比如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字创制等；7. 注意利用各种断代史和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史。当然，该书也并不忽视运用语言理论论著和教材这些比较直接的史料。由于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特点，充分利用大量的间接性史料是极为重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反映出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真实面貌，也才有可能写出一部有份量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主要利用一些间接的史料来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史书，可资借鉴者少，初创之功更大。因此，这就不是一般的写史的问题，而是首先要对中国理论语言学本身做出研究，然后再做出史的研究。正是这种双重研究的极大困难，使得这部史书在史料的处理和史的研究上也还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

〈1〉尽管该书尽力搜罗，但因文献浩如烟海，该用而未用的仍然很多。比如80年代以来复句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认识汉语的特点，而且有些还涉及了语形与逻辑与语义的关系，具有语言理论的重要价值，而该书对这一领域的论述似显不足；再如病理语言学是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都很高的一门分支学科，我国对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在精神病人的语言分析、聋哑人的语言康复、口吃者的语言矫正以及译介评论国外关于失语症的成果也有一些，该书对此论及更是欠缺。

〈2〉尽管该书比较重视从间接材料中提炼出中国的语言理论，但是，还是使人觉得一般的叙述过多，而理论的提炼不够。例如“五四”以来修辞学有较大发展，但是，该书似乎一般介绍花费气力很多，而这些发展在对于汉语特点的认识上有何意义，对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的认识上有何促进，似乎论述不多。这样一来，也使得该书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史没有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分工，甚至有时显出学科专史拼合的痕迹。

〈3〉对于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刻画得还不够明显。比如文化语言学虽然其先驱之作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真正建立起来是在80年代中期，但是，我国古代的小学研究在此方面却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今天的文化语言学虽然其直接来源不是小学，但是也受到传统的较大影响，并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不管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还是后来出版的那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对此都有论及。但是，我们从邵、方的这部著作中却看不到古今的发展联系。该书曾把“清晰的历史线索”作为撰写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一条追求（4~5页），但是由于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发展脉络不大明显而带来的困难，使得这方面还存在一些缺憾。

〈4〉要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面貌，并看清其特点其长短以及在世界理论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必要把它与世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作些比较，特别是同西方的发展作些比较。作者在《绪论》中提出了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五项任务：第一，探讨中国理论语言学创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第二，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三，对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重大事件，包括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第四，对主要的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得失及其影响，以及重要的理论语言学论著作出公正客观的评述；第五，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中国理论语言学

发展的前景(5页)。五项任务的提出是很有见地的,但其中明显缺少与世界理论语言学发展的比较这一任务。这部书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少,除了做到这一点有较大困难之外,与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也不无关系。当然,对于一部首创之作来说,提出这一要求也许过点了。

理论语言学既是对语言研究的理论总结,又对语言研究具有促进指导作用。在没有具体语言研究成果或研究成果不多的情况下盲目建造理论是不切实际的,所建造的理论也不一定有什么价值;但是,不注意语言学理论的探索,没有较为强烈的理论追求,对于语言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目前的中国语言学界似乎更该注意后者。邵敬敏和方经民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根据对于理论语言学的广义理解,不仅明确指出中国有理论语言学,而且苦心经营,深入发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总结出中国丰富的语言理论成果,揭示出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和许多特点,而且,也指出了中国语言学界忽视理论的弊端,高声疾呼语言学界要重视理论研究,并对如何进行理论研究和史的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展示了在此设想的框架中所研究的成果。尽管此书还可能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开创之功不容小视。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给中国语言学界带来积极影响,也期盼着中国的理论语言学能有较大的发展,为世界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输送出中国应该输送的成果。

**【责任编辑:王正刚】**